

张文儒 著

品味哲学与文化

枯木一枝



哲林一枝

——品味哲学与文化

张文儒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林一枝：品味哲学与文化/张文儒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7
ISBN 978 - 7 - 5080 - 8534 - 0

I. ①哲… II. ①张… III. ①哲学—中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5528 号

哲林一枝——品味哲学与文化

作 者 张文儒

责任编辑 黄 欣

装帧设计 天之赋设计室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19

彩 插 页 3 页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1949.10.15.念別離學同儒文張送歡級九三秋高學小本正市安西



作者与小学同窗 (1949年10月于西安,前排右四为作者)



作者中学留影
(1953年秋于太原)

作者高中毕业留念
(1955年于太原,前排右一为作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55级毕业留念 1960年8月



大学毕业留念 (1960 年于北京大学, 第二排右五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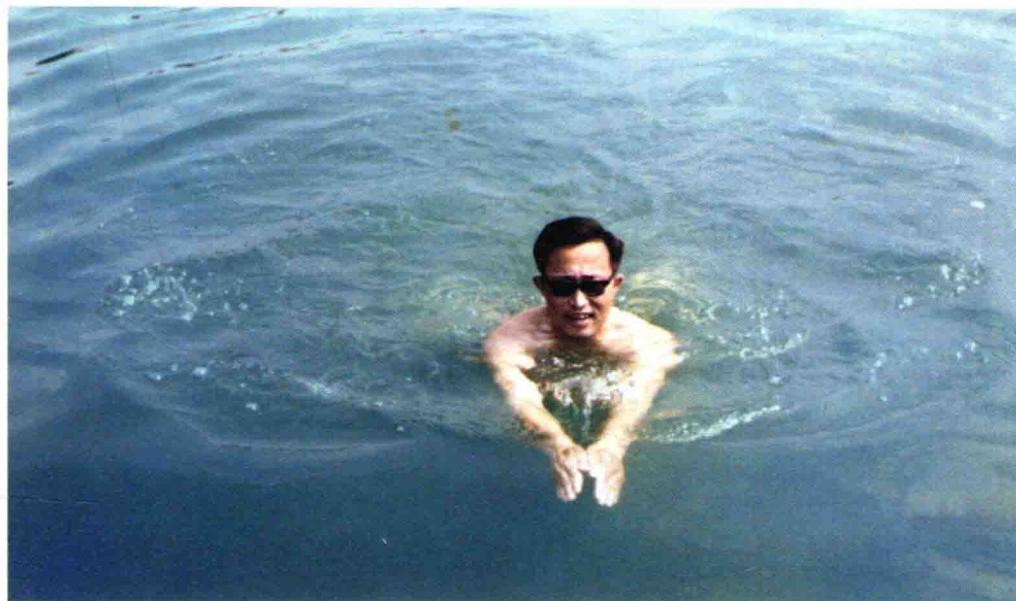
作者在伦敦植物园 (2003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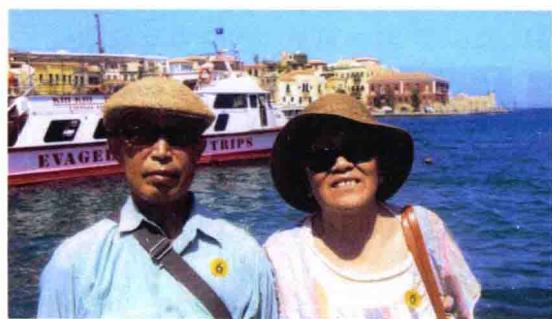
作者参加题为“孙子兵法与现代科学思维”的
两岸中国哲学学术讨论(1992年6月于台北)

靜寧油培

文傳先生題 甲午夏九月三叟楊辛



作者在武汉东湖游泳(1985年于武汉)



作者偕夫人在希腊克利特岛(2013年8月)



作者在黄山脚下(2000年于安徽)



作者参加俄罗斯远东所举办的“中国文明与世界”的学术讨论，报告题为“辩证地把握中国文化传统”(19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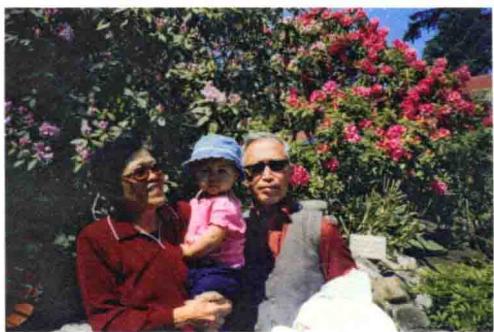
作者参加北京大学国学院举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报告题为“东西方兵学文化意识的比较研究”(1998年5月于北京香山)



作者参加日本大正大学举办的佛教文化学会学术大会并作题为“梁漱溟佛学思想——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的学术报告(1997年秋于东京)



作者在书房阅读(1999年于北京寓所)



作者与夫人及外孙女贝贝在温哥华(2004年5月)

作者的话

哲学是苦涩的，文化却是丰富多彩的，以独到的哲学视角剖析多姿多色的文化现象，是一件有兴味的事。

我是在十多年前从学校退休的。退下来以后，头几年继续带研究生，以后便投入了在职时尚未完成的写作。由于时间较为充裕，又陆续完成了《“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及《中华兵学的魅力——中国兵学文化引论》这两部书的创作。

在写作之余，也常常会翻看自己以往所写的若干著作与文章。渐渐发现，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除了个别的应时之作以外，主要的作品大体上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哲学与文化的相互关联。具体来说，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反过来又以丰富的文化意识内涵为哲学本身提供营养。如我钟爱的兵学文化便是如此。我写作的着力点不是具体的兵学内容，而是透过兵学本身，发掘隐藏在兵学内容背后的文化意识内涵、思维特色和人文睿智。其余研究文化问题的作品，如《论中华文化意识的整体性格》、《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文意识的基本特点》等，也是从文化层面切入，最终归结到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至于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著作，如《中国现代哲学的源、流与结构考》、《用分析的方法对待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等，则更是哲学思维方式的生动运用。

总之，秉持哲学与文化的彼此交融与互动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宗旨与理念，是我三十余年来坚持的哲学研究的路径，本书之所以取名为“哲林一枝”也正是此原因。换言之，我之所以会有本书所列的一些文章与著作（片断），并在学术研究的领域有所斩获，实缘于此。

如果有人设问，哲学与文化究竟是何种关系？不妨这样回答：两者既是包含与被包含、又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即一方面，广义的文化包含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军事学、教育学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诸多内容，哲学只是其中一种。但哲学之位置特殊是在于：它是一切文化意识的思想基础，它大体上决定着某种文化意识的特征，如表现形式、成熟程度与发展方向。打一个比喻，它像是一只领头羊，头羊带到哪里，羊群便会跟到哪里；或者说，哲学是文化的根，文化是大树上的枝干与盛开的花朵；哲学之根扎得愈深，文化枝叶便愈繁茂；根所吸收的营养愈充分、愈丰厚，文化之树便愈能枝叶扶疏，华实烂漫。

本书以“品味哲学与文化”为副题。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按顺序编排分为三个部分：一、哲学，二、哲学与文化，三、哲学与兵学文化；也是为了阅读方便，书中大部分篇章都设有提要，供读者选读时参考。

引子

文集的编选勾起了许多回忆，有几句话要敬告诸位读者。

我祖籍山西，生于太原。孩提时代经战乱之苦，屡屡转学。1950年就读于太原五中。1955年秋东向负笈京师，入北京大学。记忆中当时是在前门车站下车，乘接站的北大校车（敞篷大卡车）出西直门。那时的北京西郊甚是荒凉，沿途只见到两三所院校，几座新楼，像是点缀。

然而，进入北大南校门却是另一番景象。从哲学楼至南校门的通道上，排满了新生接待站。人们穿梭往来，欢声笑语。迎面悬挂的是醒目的横幅标语，如“欢迎未来的哲学家”（其他如“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等），“北京大学是科学家的摇篮”、“向科学进军”等。整个校园热气腾腾。新同学们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欢乐的海洋，个个脸上堆满了笑，连阳光也比平时灿烂了许多。

我来校前对北大哲学系已有所耳闻。曾听五中一位叫刘达仁的老师（北大哲学系1952年毕业生）介绍：北大哲学系是个老系，许多著名哲学家在此任教，冯友兰就是其中之一。刘老师还把冯著《新理学》拿给我看，说：你如果考取了这个系，一定会见到许多老先生，说不定还会由他们指导你写论文呢。

我正是抱着这样一种朦胧幼稚的想法和美好的愿景进入北大哲学系的。

大学前三年的学习是平稳而有序的。学到许多从未接触过的哲学原理和哲学史知识，也阅读了不少经典著作，可以说是得到了有关哲学知识的“科班训练”。

中外哲学史由不同老师讲不同段落。如中国哲学史先后由朱伯崑（先秦、两汉）、汤一介（魏晋南北朝）、任继愈（宋明）、邓艾民（近代）先生依次讲授。西方哲学史则由齐良骥、任华和张世英先生讲授。逻辑学由吴永曾讲师授课。此外，冯友兰先生讲“史料学”，黄子通讲“孔孟荀哲学”等。稍有缺憾的是，另一些著名的教授如张颐、宗白华、邓以蛰、贺麟、熊伟、洪谦等都未正式开课，有的到上大三时连面也没见过。^[1]

虽说课程的设置与老师的安排尚不尽如人意，但是，这并未影响到莘莘学子的求知热情。况且课程内容也有不少闪光之处。如于光远先生建议开设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讲座”，就几乎把全校理科方面的学术权威都调动起来。物理系的褚圣麟（原子物理）、黄昆（固体物理、半导体理论）、周培源（相对论）、徐光宪（物质结构）、王竹溪（热力学）、赵以炳（巴甫洛夫学说）、崔芝兰（从猿到人）、乐森燦（古生物理论）、杨海寿（天文学）等，都曾上台授课。记得赵以炳教授上课时，把一只狗牵到了课堂。崔芝兰讲人的进化过程时，课桌上摆了许多生物标本。杨海寿在讲完课的当天晚上，带着我班学生在南北阁旁边的草坪上用望远镜观察天象。同学们既好奇又欣喜，虽然由于自然科学基础薄弱，大家对老师们所讲的内容不能全部听懂，但总觉得脑子里已增加了不少信息，而且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每每忆及这些，都不由得对这些先辈心存感激。

那时学生的学习热情之高，是现在的在校生难以想象的。所有的同学，无论是调干生还是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大家都怀有一颗热爱祖国和报效祖国的心。因此，都在争分夺秒地吸取知识，生怕有丝毫耽搁。例如，学生为赶往上课的教室，在校园里快速奔跑（当时，学生中能买得起自行车的人极少）；到教室后，又抢坐前三排，为的是离授课老师近些，听得清楚，能看清讲台上的板书。下课后赶往其他教室，又是一阵奔跑。奔跑途中，书包旁边挂着碗袋，饭碗和勺子相碰，叮当作响，成为校园里一道风景线。再有，抢占阅览室的座位，也是学习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从周一到周日（周六除外），每天晚饭后都会背着书包去阅览室或图书馆抢座位。只要座位抢到手，当天晚7点半至9点半的

学习效果便有了保证。遇到星期日，更要起早去占座位，因为这一天都没有课，座位相对紧张。

在我们上大一、大二期间，仿效莫斯科大学的做法，把所有课程尽可能排在上午。一上午排六节课；每节课 45 分钟，要从早 7 时 15 分排到 12 时 40 分。上到第五六节课时，简直个个被弄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好在当时年纪轻，胃口也好，为了能把课听下来，又买不起其他营养品，只能早餐时拼命多吃。记得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守则，上午有几节课吃几个馒头，最多到六个馒头。另一条措施是加强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大体上是早起长跑，下午 5 时后打篮球，雷打不动。

之所以会有如此高昂的学习热情，也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是时代的最强音，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被一种亢奋而激越的情绪所包围。虽说谁也不讳言将来也许有一天会成名成家，但这绝不是个人追求的首要目标。人们心里想的是祖国强盛、国家地位提高和人民生活改善，其次才是个人抱负的伸展。从这层意义上说，当时我们这群人还真是非功利的读书者。

然而，历史的发展同人的愿望往往是脱节乃至背离的。从 1957 年夏开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简直使人应接不暇。在校生们虽然仍在上课，但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被裹挟到政治运动的浪潮里。校园里的氛围原本是恬淡而宁静的，此时却变得喧嚣而紧张。人们不但难以心无挂碍地埋头书斋，甚至连往日在闲暇之余到未名湖畔去尽情享受美丽的湖光塔影，并欣赏由此而氤氲的诗情画意的机会也少了许多。到 1966 年更是如此。亲眼所见，往日沉静而美丽的校园，一夜间被卷入“十年动乱”的漩涡，而我所在的系还是漩涡的中心。运动一开始，我虽然与周围的同事们一样，甚感茫然，但毕竟是跟着潮流投入了运动，当时的情绪还很高涨。但随着斗争的深入，有许多老干部被打倒在地，其中也有我的亲属，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再到后来，连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学生也未能幸免。

那时的燕园被钦定为“资本主义黑窝”、“修正主义大染缸”。北京大学被说成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我当时虽只是一名刚毕业

不久的青年教师，也理所当然地被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一类。北大的老师们，无论年长或年轻，都像是生来就背负了“原罪”，自认为是“赎罪”，当务之急则是下干校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于是，按照工宣队的部署，从1969年9月起，我和哲学系多数老师一起，被赶到了江西南昌县的鲤鱼洲干校。

当时的心情真是坏到了极点，“文革”耽误了大好的青春时光姑且不说，还被戴上一顶“臭老九”的帽子；又听说大学也不办了，更是觉得前景堪忧。

我们所到达的鲤鱼洲，据当地人说，原来曾是一块盗匪出没和销赃的不毛之地。此地段濒临鄱阳湖，堤内的地比堤外的湖面还低，时常有被淹没的危险。为了赶修排灌站，凡年轻一点的都被安排上大堤卸砖、卸水泥袋、扛木料，每天干完活都累得直不起腰。这里还是有名的雷区、血吸虫传播区及高热地带，“五七”战士们不仅要“睡草棚”、“吃咸菜”（蔬菜供应奇缺），顶着烈日下地，还要同血吸虫、大蚊子搏斗。当时在连队里盛行一种“三猛”战术的说法，意思是“猛吃、猛干、猛睡”，其实是破罐子破摔。此话传到工宣队员耳朵里，被认为是对“再教育”的一种消极抵抗。

除了干重活以外，还要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干校里阶级斗争的弦也愈绷愈紧。尤其到1970年前后，更是弄得人人自危，有些情况让人哭笑不得。伴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台面上的人物频繁更换，台下的人时刻会面临“站队”的问题。由于大家不了解内情，免不了有不当表态。此时，工宣队、军宣队常常要求站错队的“改正”过来，还须说自己之所以错是因为受了“蒙蔽”。有一句流行语叫“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究竟“反戈”击谁，谁也弄不清楚，这等于变相地鼓动人们相互揭发批判。对这种十分荒诞的做法，人们给它编了一个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尽的检查流不尽的泪。”这虽然是暗指干校里少数经常被点名批判的人，但也是当时恶劣政治状况的真实写照。

下干校整整两年后，奉上级指示，干校解散，人员返回北大。不过学校仍旧由工宣队、军宣队领导，继续搞教育革命，如下乡搞半工半读



等。又经过几年磨难与折腾，终于熬出了头——“四人帮”垮台，“文革”宣告结束。

我感到庆幸的是，尽管有这些没完没了的运动，耽误了人生的黄金时段，但至“文革”结束，我尚未至不惑之年。我暗想：若身体允许，上帝还留给我约有三十年的工作时间，可以利用这余下的时光，做一些自己想做而未能做的事。

也是从“文革”结束伊始，北京大学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仿佛回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那种宁静的燕园景况。而我自己，则像是走在沙漠里的饿汉，饥肠辘辘，陡然间看到了食物和饮料，便不顾一切地咀嚼和吸吮。为了弥补失去的时光，不分昼夜地忙碌着。对知识的追求似乎永无止境，研究课题也像是一个个都从脑子里迸发出来。思维犹如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始终在高速运转。就这样，创作出一本又一本书、一篇又一篇文章。也是这样，送走了一个个霜晨岁月，也告别了一个个寒冬酷夏。

当一个人安静下来时，总会思考一些问题。著名考古学家、教育家傅斯年有言：“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下的3个小时是用来沉思的。”确实如此。我常常想，从1957年到1976年，尽管风云变幻、人心浮动，但扪心自问，我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培养。希望以哲学这门学问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美好意愿，也未敢一日或忘于心。

是什么力量支持我这样做的呢？我沉思之后，答案有二：一是师长们的教导，二是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

有一位师长说过的话，至今印象深刻。

那是在1958年春，当时正值“反右”收尾和“红专”辩论高潮时期，“左”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大学生的未来是做普通劳动者，学哲学究竟有用还是无用？如有用，用在哪里？这使不少人（包括我自己）一度陷入了苦闷和彷徨。而且，面对所谓全民学哲学，人人学哲学、用哲学的浪潮，哲学系和哲学专业以后会不会消失于无形，也是问题。

针对这种困惑与迷茫，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冯定先生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作了一次简短的讲演，大意是说：哲学是高层次的学问，它既不同于物理、化学等具体科学，又不同于其他的应用学科。从总体上说，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是对的，但他强调：这种结合属于“战略上”的结合而非具体“战术上”的结合。

他这些话如醍醐灌顶，使大家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许多。这番话，实际上是否定了将哲学理论生搬硬套的做法，也委婉地批评了将哲学庸俗化的错误倾向，在人们陷于思想迷乱的时刻，给哲学重新定了位。再联系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敢于讲这些话，确实是要有一些勇气的。

冯先生在后来虽屡遭批判，但我始终记得他关于哲学是“高层次的学问”的这番话，并始终引以为自己从事哲学研究的方向和动力。

他说的“高层次”，并非一些人所诟病的“高不可攀”，而只是同其他各门具体学科相比较而言。哲学不是像物理、化学等科学只关注某一类具体的客观对象，而是关注整个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的思想。哲学所捕捉到的抽象的原则和道理，就存在于每一个具体事物之中。打一个比方，每一个事物，哪怕是该事物中一个细节，似乎都隐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这个按钮，就会如“孔雀开屏”那样，使事物的精华部分立刻显现。如何去发现这个按钮，是哲学这门学科的功能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开启人们智慧的一把钥匙，谁要想获取智慧，谁就离不开它。但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去从事哲学工作或哲学研究，而只是说，每个人都应具备像哲学思维这样一种高品位的素养。冯友兰先生说哲学看似“无用”，实有“大用”，也是这个道理。

呈现在诸位面前的这本书，正是沿着这条思路编排的。它虽说有三个部分，但一以贯之的是哲学。具体说，是哲学这一思维方式在各个学术领域的应用与展示。哲学本身姑且不论，拿文化来说，不同民族的文化说到底是不同的思维模式在历史中的显现。本书所论及的中华人文意识的整体结构及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文意识的基本特点等，都是这条思路的进一步伸展。又拿兵学来说，历来研究兵学大多只是关注兵学的具体内容，离不开兵戈剑戟、攻战杀伐之类。而我则不以此为限，重点是透过兵学内容，挖掘古人的智慧宝藏，也就是发掘其文化意识内涵、思维特色与人文睿智，也就是将兵学研究上升到了哲学层次。

一句话，本书如果说有什么特色，那就是：着眼于对哲学这一

“高层次”思维方式的独特理解和运用。本书之所以取名为“哲林一枝”也缘于此。

我的本职是研究与讲授中国现代哲学，而多年以来，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兵学文化饶有兴趣，写了不少著作，也算是我的副科。因此，载入本书的有哲学、文化、兵学三个篇章。

从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入学到本世纪初从岗位上退下，前后将近半个世纪。我感谢辛勤地栽培我和哺育我的各位师长，感谢我的家人在我写作过程中的支持与配合。感谢北京大学大量珍贵图书与完备的学术研究资料，更感谢北大建校百余年来形成的良好的学术研究传统与氛围。这种氛围使我和我的同仁们，既能依照自己的兴趣与能力，独立、自由地思考与研究，也可以相互间平等而毫无障碍地切磋与砥砺。假如缺少这些，我是不会有《哲林一枝》这样的一份绵薄之礼来献给母校及各位师表的。

2014年5月于融域嘉园

注释

-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幸见到曾给我们授课的汪子嵩先生，他当时是哲学系副主任。据称：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有鉴于不少老先生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唯心论哲学，新中国成立后改学唯物论，须假以时日，所以奉上级指示，暂时不允许他们上课。

目录



作者的话.....	1
引子.....	1
一、哲学篇	1
中国现代哲学的源、流与结构考.....	3
中国现代哲学导引	17
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对中国文化之研究	24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的理世界	35
用分析的方法对待中国优秀哲学遗产	
——从毛泽东军事著作中对待孙子和老子的思想谈起	47
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	
——评梁漱溟人生哲学的一个特点	53
二、哲学与文化篇	65
论中华文化意识的整体性格	67
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文意识的基本特点	77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几点断想	88
吸取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98
论中国的科学和科学意识.....	105